

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

——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例

张景明

(大连大学 美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器的出现也几乎与中原地区同期,但却有其自身发展的渊源。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已经达到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艺术风格。随着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交往,青铜器与亚欧草原的艺术风格达到一致并有所创新,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艺术相互影响,加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使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关键词】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造型艺术;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8)04-0056-04

一、北方草原地区早期青铜器艺术与铸铜技术

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今内蒙古地区),从考古学上可以分为东南部和中南部两大区系类型,代表了东、西两个原始文化区。东部包括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从距今8000年前延续到4000年前,以之字纹、筒形罐、彩陶和彩绘陶、玉器等为文化特征。西部包括白泥窑文化遗存、庙子沟文化遗存、阿善文化遗存、老虎山文化遗存、永兴店文化遗存、客省庄文化系统遗存,从距今7000年前延续到4000年前,以彩陶、石铲、石城遗迹等为文化特征,并且受到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东部文化区红山文化的影响。

东部原始文化区兴隆洼文化的石器采用打制和磨制两种技术,由于此种文化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用这两种方法制作的工具比例也各不相同;陶器制作较粗糙,火候低,陶色不均匀。赵宝沟文化

的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少量的琢制和打制石器;陶器以夹砂为主,火候低,陶色不均,少量的泥质陶火候较高;骨器多为磨制。红山文化的石器分磨制、打制和琢制三种,磨制的比例较大;陶器中的夹砂陶以灰褐色、黑灰色为主,泥质陶有黄褐、灰褐和红褐色等,陶色多不纯;夹砂陶火候较低,质地疏松;泥质陶的质地坚硬,火候较高;玉器采用磨制和钻孔技术,显得晶莹透亮。小河沿文化的石器多采用磨制技术;陶器烧制的火候较高,陶色均匀。

在西部原始文化区,白泥窑文化遗存的石器有打制、磨制和琢制;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还有薄胎砂质陶,泥质陶的火候较高。在庙子沟文化遗存中磨制、打制、琢制石器并存,亦见磨制的骨、角器;陶器均系手制,火候低,陶色繁杂。阿善文化早期遗存中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和骨角器,多为磨制;晚期遗存中磨制石器增多,陶器的烧制火候也比早期增高,色泽纯正,器表多磨光。老虎山文化遗存中的石器除磨、打、琢制外,还有压制的细石器;陶器以褐陶为主,也有灰陶和黑陶,烧

* 本文系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项目编号:07BF35)成果。

【收稿日期】2008-04-05

【作者简介】张景明,男,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制火候高。客省庄文化系统遗存的陶器为夹砂红陶、砂质红陶和泥质灰褐陶,多数素面磨光。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角器、陶器、玉器的制作技术,为金属的冶炼和制造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时期已经发明了铸铜技术。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内有类似鱼钩状的空隙,为铸铜的范。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第四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1]中,随葬一件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质,证明北方草原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

在夏早期至商晚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先祖不仅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而且能铸造多类器物。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除发现有小型青铜物件外,还发现了大型青铜器,时间几乎与中原地区相当。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群^[2](PP.189-191)]的时代相当于夏代晚期,青铜器的种类有铜耳环、铜指环、铜斧帽饰等。铜耳环、铜指环为合范铸造,耳环有一段宽扁处,在此锉断开口,环表面有锉磨痕。铜斧帽饰的接口两端有范缝的痕迹,系用两块外范、一块范芯铸成,可见当时已掌握合范和内范的铸造技术。在赤峰市四分地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遗址^[3]的窖穴中,发现一件陶范,为合范中的一扇,在铸面上部喇叭形铸口下有联珠状铸体,范的顶面和两侧都有对范的刻划符号,尤其是铸面的右下侧还做出规整的小圆窝,这是合范子母榫扣合的母榫,说明使用合范已达到相当规范的水平。在辽宁省锦县水手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的墓葬^[4]中,发现的铜柄戈,铜柄与戈体连铸为一体,柄两面满饰花纹,为菱格纹内填联珠纹,戈体重量超过1千克,证实当时已能一次熔炼和浇铸上千克的铜液,同时铸出比较复杂的花纹。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存^[5](PP.233-235)],相当于早商时期,出土有铜爵、铜鬲、铜短剑、铜刀等,既有中原地区的器物,也有北方草原特征的典型器物。刀、剑、戈、镞采用两块外范的铸造技法,爵、鬲采用分范合铸的技术。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鬲和陶爵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形制接近,器物的流口间和腹身接合处常见有成排泥质铆钉装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铆钉装饰手法非常相似。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点,彩绘纹饰中的饕餮纹、带目夔纹、云雷纹等以及纹饰在器物上的位

置,都与商代青铜器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北方草原地区青铜艺术的繁盛期

西周至春秋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明逐渐走向繁盛时期,主要表现在分布于努鲁儿虎山以西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按地域看,北部龙头山类型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南部的南山根类型以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为代表,随葬的青铜器种类繁多。1985年,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6]发现青铜礼器、生产生活工具、车马具、装饰品等,数量达400余件,类型有鼎、簋、甗、鬲、壶、罍、尊、匜、豆、斧、铍、凿、锥、当卢、衔、轭、马冠、蟠首、车穿、短剑等。青铜礼器和容器多数纹饰繁缛,并有许多附件,采用分范合铸技术,附件(耳、兽等)先用范铸出,然后接铸在器体上。如别人守门纹方鼎,敞口,弧腹,方形底座,四兽足,腹部接铸两个对称的方形竖耳,四角分别接铸翘角、露齿、怒目的立兽;腹部饰回纹和夔龙纹,底座左右两侧开小方窗,背面镂空,正面设可以启合的两扇小门,一门上饰一兽钮,另一门侧坐一守门人,底部镂五个方形孔;四兽足也为接铸,兽两耳竖起,怒目张嘴。这件器物采用了分范合铸、接铸、镂空等复杂技法。兵器、车马具、生产生活工具等,多采用两块范铸造,也有单范和内芯。有的器物表面有砂粒和修磨痕迹,可能使用了失蜡法,使铸造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虽然有部分礼器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但当地已有先进的铸造技术亦是无可非议。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动物纹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分为鸟禽类、兽类、其他类三大类别。鸟禽类包括鸭、天鹅、鹰鹭。鸭纹的代表器物有鸭纹青铜扣饰、鸭纹圆形饰牌,分单体和群体两种表现形式,群体鸭纹装饰规划整齐。天鹅纹的代表器物有天鹅形青铜饰件,天鹅呈飞翔状。鹰鹭纹在一件青铜罐上表现为圆眼、勾喙、利爪,线条简练,形象生动。兽类包括虎、豹、马、牛、羊、鹿、獐、兔、鼠等,造型分蹲踞、伫立、奔跑、卷曲诸式,也有只表现动物首部的。其他类包括怪兽、蛇、蛙等,怪兽的嘴似牛,有须,圆眼,头上长双螺髻形角,蛇呈纠结式。表现手法多为写实性。这种写实是形神兼备,力求用准确的形态表现出动物的神韵。如伫立的马,尖耳,细腰,圆臀,宽胸,呈昂首挺胸的矫健姿态;奔跑的兔,昂首翘尾,四肢用力,腰身拉长,一副疲于奔

命的状态;飞翔的鸟,双翅平展,双爪后曳,显示出悠然自得之态。当时,人们通过对现实动物的观察,细致刻画动物的形与神,使其整体造型栩栩如生。

这一时期的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变得更加干冷,农业逐渐萎缩,畜牧业地位上升。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朱开沟文化的后裔“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类似的文化遗存,从燕山以南的冀北、京北,向西经内蒙古中南部,至陇东高原均有发现。鉴于各文化的差别,在北方沿长城地带形成了东有山戎,西有乌氏、义渠诸戎,北有狄的分布格局。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主要是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仍保留有农业经济的痕迹,但以畜牧业为主。关于其族属问题,以前学术界曾定为属东胡。现根据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记载,证实为山戎所创。按文献记载,山戎在孤竹北,孤竹位于辽西,山戎只能在辽西迤北,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相同。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于晚商,在两周之际繁盛,春秋中期以后衰落。山戎也是在春秋前期“越燕而伐齐”,随后又“病燕”,活跃一时,遭齐桓公打击后“山戎走”,此后几乎不见其活动。两者兴衰变化的时间完全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人群以牧业为主,逐渐向南迁移,替代以农业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符合“随畜牧而转移”的山戎历史,因而在青铜器的种类和装饰艺术中也有大量表现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

三、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反映文化多样性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和文化内涵表现出既有本地区文化的特色,又有西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征,这是不同地区文化间相互交流的结果。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出土的“许季姜”青铜簋,在造型上为标准的中原礼器,内底铸铭文,为“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中的姜是姓氏,许为春秋时期的许国,其活动地域在今河南省许昌、南阳一带,季姜为姜姓女子嫁与许国者。最后因为政治上或其他某种原因,由中原地区传入北方草原地区。别人守门纹方鼎中的别人,失右足,与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庄白微氏家族窖藏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只是别人失左足,二者应为一对。“师道”铭青铜簋,在内底铸有铭文94字,记载了师道受王赏赐之事。在文献记载中,也能看到山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史

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是后六十有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63年)曰:“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山戎与齐国、燕国、郑国等发生战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还吸收了二里头、先商、岳石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体成分来自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又融入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并呈现出沿大兴安岭一侧与松嫩平原青铜文化的密切交往关系。在辽东半岛发现的辽东地区早期青铜文化^[7]中,其文化内涵逐渐向外渗透,向西占据了大小凌河流域,甚至越过努鲁儿虎山到辽西腹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生联系。分布于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和松嫩平原东部的白金宝文化,其内涵与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克拉苏克文化,在年代上从公元前13世纪延续到公元前8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在该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短剑中,剑首是蘑菇形、环形和铃形的短剑,大多有凸齿状剑格,有的柄部装饰弦纹、锯齿纹或凹槽。这种类型的短剑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器种,时代也比较早。如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一〇一号墓、南山根东区石椁墓、辽宁省建平县烧锅营子一号墓^[8]等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器物。追溯其渊源,可以在早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李家崖文化^{[9][10]}遗存中找到,说明这种类型的短剑不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原生器类,而是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前苏联著名的考古学家C. B. 吉谢列夫认为,分布于伏尔加地区的塞伊马文化的铜矛、釜斧、刀向东传播,一直影响到安阳商文化青铜器的改变,公元前13世纪之后商文化又反过来向北传播,其影响直至叶尼塞河中游的卡拉苏克文化^[11]。但这种釜斧早在商代的遗址中就已经发现,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同类器应该是从中原地区传入,并非受塞伊马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继卡拉苏克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塔加尔文化,年代为公元前7

世纪至前1世纪。与卡拉苏克文化相比,开始出现“野兽纹”,但最初阶段的野兽纹并不发达,主要有圆雕、野猪、山羊、马、鸟首等。到公元前5世纪,塔加尔文化中的野兽纹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出现的纹饰来自阿尔泰的某些艺术形象,最具代表的是屈足鹿、卷曲成环的猛兽、虚幻的动物、口衔动物的伫立状猛兽等。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动物纹器物看,屈足鹿、环状猛兽的年代要早于塔加尔文化。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12](PP. 58~72)出土的屈足鹿形青铜饰牌、宁城县那四台出土的屈足马形金饰牌、小黑石沟出土的环形豹纹青铜马衔、环形虎纹青铜饰牌、环形豹纹金泡饰等,这些标本都比塔加尔文化的年代早,很难说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类动物纹就是受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应该有自己的渊源。

在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形成了斯基泰文化,以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艺术为特征。兵器有短剑、剑、弓、镞等,马具主要是衔、镡、笼头部件,其种类远不及夏家店上层文化发达。斯基泰文化早期的装饰品只有金铜耳环、螺旋饰、饰牌等,并没有很多的动物纹装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丰富的动物纹装饰艺术更无法相比。威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是早期萨基人的活动地域,目前所发现的文化遗存的数量不多,兵器有带銎镞和柳叶形短剑,装饰品有不同类型的金银耳环,文化内涵比较单纯,也无法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去作对比。图瓦地区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文化遗存以阿尔然王陵为代表,出土了青铜短剑、啄锤、衔、镡、卷曲成环的虎纹饰牌、圆雕绵羊顶饰等^[13],这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时代接近,但文化内涵还是比不上夏家店上层文化。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已经拥有了斯基泰文化的三要素,兵器、马具和动物纹艺术的种类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种认为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文化源于欧亚草原西部的说法值得怀疑。

总之,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进入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以后,欧亚草原通道发生了很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草原通道的文化呈现共同的特征,并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逐渐向一致性发展,形成了介于游牧经济带和农业经济带之间的游牧经济带,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的接近,反映在文化形态上必然有其共性的一面。由此看出,在匈奴统一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和草原丝绸之路全面开通以前,草原通道就已经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载

体,这种交流一方面是东西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导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至黑海沿岸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墓葬中,发现中国丝绸的碎片,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1500年之间(《丝绸古道又有新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2日)。因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的青铜器和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类型和纹饰,在某些方面与蒙古国、俄罗斯、中亚等地的相同性,充分证实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通过草原通道发生的文化联系,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并不是直接的交往。正如乌恩先生所言:“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么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14]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依靠那些游牧人作为中介来进行的。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从其造型艺术看,综合了文化交流的结果,呈现出多样性的青铜文化。

[参考文献]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 文物, 1980, (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Z].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 [3] 辽宁省博物馆, 等. 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83, (5).
- [4] 齐亚珍, 刘素华. 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及铜柄戈[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 (1).
-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6] 项春松, 李义.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 文物, 1995, (5).
- [7] 陈国庆, 华玉冰. 大连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8] 建平县文化馆,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 考古, 1983, (5).
- [9] 吴振录.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 文物, 1972, (4).
- [10] 杨绍舜.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J]. 文物, 1981, (8).
- [11] C. B. 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在北京所作的学术报告[J]. 考古, 1960, (2).
- [12] 齐晓光.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 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 [13] 格列诺夫. 阿尔然——早期斯基泰时期王冢[M]. 列宁格勒, 1980.
- [14] 乌恩. 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A]. 中国考古学研究(2)[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何天明)